

魯迅同中国古代偉大思想家們的关系

任繼愈

(北京大学哲学系)

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將、偉大的思想家、偉大的革命家魯迅离开我們整整二十年了。在这二十年的時間里，我們不但取得了魯迅所响往的使全国人民能够生存、温飽，而且向着更美滿、更廣闊、更崇高的人类共同的理想——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迈进。

我們今天所获得的胜利中也有魯迅的偉大功績。在过去的艰苦的岁月里，魯迅曾分担了

的道路，就是中国人民探索革命，进行革命斗争的道路。“魯迅的方向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毛澤东选集，669頁)。

魯迅永远活在中国人民的心里，就在于他的一生和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斗争相結合，他和广大人民共患难、同命运。他是在历史悠久、文化遗产極丰富的土壤里哺育成長起来的，也是在旧中国这块灾难深重的土壤里磨煉出来的。

任何思想的产生，都不能脱离了培育他生長的土壤。魯迅曾受过西方进步的资产阶级革命思想的激荡，受过近代科学訓練和苏联进步作家的影响，接受了达尔文主义。这些条件对魯迅來說都是非常重要的，也是大家所熟知的，现在不在这里談。这些条件都只能作为構成魯迅的革命思想的外因，不通过內因，只有外因就不会起作用。

人民的苦难，領導文化界向反动势力进行斗争。为了紀念我們的偉大的导师，我們有更深入地向魯迅學習的必要。

在五四以前，作为旧中国的啓蒙思想家，魯迅是中国的別林斯基；在五四以后，直到魯迅的逝世，作为在馬克思主义領導下的文学家、思想家，魯迅是中国的高尔基。因为魯迅所探索的中国革命的道路，进行革命斗争



什么是决定鲁迅的哲学思想发展的内因呢？

决定鲁迅革命思想发展道路的是旧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条件，和中国固有的优秀的民族文化传统。关于社会条件这里不准备多說，瞿秋白同志的“鲁迅杂感选集序言”（瞿秋白文集，977页，人民文学出版社）已做过深刻而正确的说明。本文只着重研究鲁迅和中国民族文化继承和发展的关系。

鲁迅先前在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浪潮影响下，后来在党的思想领导下勇敢地担任了向封建主义、帝国主义战斗的任务。在这一艰巨的思想战线上，为了打垮敌人的反扑，他不得不深入到中国优秀的文化传统中摄取营养，积蓄力量。残酷的革命斗争的实践，逐渐使他学会了怎样打击敌人；优秀的文化遗产，帮助了他从敌人的内部更有效地挖空了敌人所凭据的思想堡垒。如果忽视了中国民族文化传统中的进步思想对鲁迅的思想所起的巨大作用，就会妨害了对鲁迅的正确认识。

哲学史上无数的事实早已证明了：任何新思想的产生一方面有它的阶级基础，一方面有它的思想传统。鲁迅的哲学思想的发展也不例外。我们怎样理解文化、思想的继承性呢？

从哲学史上看来，从思想斗争的第一天起，就有进步的与保守的思想的斗争，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斗争，这两条路线贯穿到底。不但过去、现在是这样，将来的共产主义社会，阶级消灭了，思想斗争也还存在。（参看人民日报“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毛主席指出，“我们是马克思主义者，我们不能割断历史。”在古代阶级对抗的社会里，两种文化经常斗争的阵线是：一边是为剥削阶级服务的文化和思想体系，它和广大人民的利益处在对立的地位；另一边虽然也是剥削阶级中的人物所创造的文化和思想体系，但是这种文化和思想体系和广大人民的利益息息相关，它是为人民所关心的，是属于人民的。它也是促进进步的新文化、新思想产生的真正源泉。鲁迅的革命思想显然是属于后一种体系，而不属于前一种体系。

富有革命性的、进步的思想体系经常和它当时占统治地位的保守的、甚至反动的思想体系作斗争。革命性的、进步的思想经常被正统派指为“叛逆”、“异端”，因而被压制，就象压在巨石下的斜逸横出的古树。环境尽管对它不利，可是它有顽强的生命力，任何力量也压制不住它的生长，“正统派”的保守思想不能消灭它。鲁迅曾说过：

“幸而这一类教训（作者按：这一类教训是指‘正统派’的保守思想），虽然害过许多人，却还未能完全扫尽了一切人的天性。没有读过‘圣贤书’的人，还能将这天性在名教的斧钺底下，时时流露，时时萌蘖；这便是中国人虽然凋落萎缩，却未灭绝的原因。”（“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坟”，122页）

当然，这种在“名教的斧钺”底下萌芽的思想，腐朽了的剥削阶级的老爷们是看不惯的，因为它有几分“二心”，对“名教”有危害，只能被指为“异端”。鲁迅的革命性的思想，如果我们要指出它的继承性，那末他所继承的恰恰就是一向被剥削阶级的反动统治者看作怀有“二心”的“异端”的传统。鲁迅之所以遭到“正人君子”和“卫道者”们的“围剿”，事情一点也不奇怪。因为这两种传统从来就是敌对的。

有些人仅仅从鲁迅著作中的字句着眼，认为鲁迅既然是一个革命者，就要打破一切传统，不要任何凭借，反对一切过去的东西。我们试翻开鲁迅的著作看，的确有推翻一切

的話。比如魯迅就說過：

“我們目下的當務之急，是：一要生存，二要溫飽，三要發展。苟有阻礙這前途者，無論是古是今，是人鬼，是三墳、五典，百宋千元，天球河圖，金人玉佛，祖傳丸散，秘製膏丹，全部踏倒他。”（“忽然想到”六，“華蓋集”，47頁）

魯迅也曾說過：“少看中國書，其結果不過不能作文而已。”魯迅以為“去讀古書，却比不能作文之害還大。”（答“兼示”，“准風月談”）

那些民族虛無主義者，像胡風之流，自稱是魯迅思想的繼承者，對民族文化遺產採取一脚踢開的態度，這是極端反動的。我們仔細讀過魯迅的著作，就會知道在文化遺產的繼承問題上，魯迅是最能吸收和發揚民族文化遺產的優秀傳統的。魯迅是愛國主義者，是民族虛無主義的敵人。但是魯迅所繼承的，乃是一向為正統派所鄙視、所壓制的“異端”思想。魯迅說得很清楚：

“我們從古以來，就有埋頭苦干的人，有拚命硬干的人，有為民請命的人，有捨身求法的人，……雖是等於為帝王將相作家譜的所謂‘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們的光耀，這就是中國的脊梁。”（“中國人失掉自信力了嗎？”“且介亭雜文”，113頁）

事實已說得很清楚了，喪失了民族自信心的人，安心出賣祖國文化、在思想上作了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奴才的人，應當明白，魯迅是最愛國的，是最尊重文化遺產、最能接受文化遺產的人。他所繼承的不是什麼帝王將相們所謂正統派的思想，而是真正的“中國的脊梁”。這種思想是中國傳統文化的支柱。

在中國古代思想中哪些是我們的優良傳統？

毛主席曾指出過，在幾千年的封建文化中有“封建性的糟粕”，有“民主性的精華”。精華，就是唯物主義的思想、科學思想或者是為科學開辟道路的思想傳統，反權威、反壓迫的傳統。中國古代文化中糟粕和精華的區別，魯迅有極深刻的認識。中國古代許多偉大思想家經常在魯迅的筆下出現，並通過他的批判取捨，把精華部分介紹給讀者，也把糟粕部分給以揭露。有些思想家遭到魯迅的諷刺和嘲笑，有些思想魯迅通過藝術形象得到表揚。但是我們還不能簡單地從文句上的批判和表揚來區別魯迅繼承的是哪些思想，反對的是哪些思想，僅僅這樣是不夠的。

例如在字句上，魯迅曾對影響最大的思想家孔子在許多地方採取攻擊的態度，否定的態度。如果從字面上作這樣的理解，就會完全和魯迅的真正見解相反。因為在魯迅和反動思想作鬥爭的時代，封建主義和帝國主義結成聯盟，打起“保存國粹”的招牌，為封建道德張目，不但遺老們要祭祀孔子，民國成立後的教育部也要派魯迅這些職員們向孔子的牌位磕頭，北洋軍閥擬定的偽憲法草案上居然規定“以孔教為國教”。連洋博士胡適之流也在“整理國故”，這些新文化的敵人幾乎拿出全付力氣向新文化反攻。他們都在利用孔子作為工具，就連無恥的袁世凱和流氓土匪頭子出身的軍閥張宗昌們也“把孔夫子拿出來當磚頭用”。魯迅看得很清楚，這些魔鬼們和他們御用的文人越要高舉孔夫子這塊聖人招牌來反對人民革命，而魯迅“要打倒他（作者按：他是作為招牌用的孔子）的欲望也就越加旺盛”。我們與其說，魯迅所攻擊的不是兩千多年前的孔丘，他所攻擊的是反動勢力所崇拜的偶像化了的“聖人”。因此，魯迅的筆下有時故意對孔子來一點“不恭敬”，使得那些道學先生們在魯迅的嘲笑下更加顯得狼狽。孔子雖然是在中國第一個偉大的思想家，但也存在

着很多缺点，从科学的态度着眼，为什么不能批判呢？事实上，五四前后新文化革命高潮时期，当新思潮以排山倒海的压力摇撼着封建文化的堡垒，而封建文化也据壘頑抗的时候，当时实在不可能对孔子的思想作出全面性的分析。因而反对孔子的理論中有些是偏激了些。尽管有些偏激，但为了向旧文化进攻，在战略上还是正确的。魯迅和其他新文化的战士们打击那被反动派哄抬为“大成至聖文宣王”，向“道冠古今”、“德配天地”的神象抛几块磚头不但是可以，簡直应该这样做。这种神聖化了的孔子不但魯迅要反对，就是今天要写哲学史也不允許把孔子哄抬到神聖的地位，虽然孔子有許多偉大的貢獻。魯迅对孔子的估价是相当公允的。他說他反对孔子的理由是由于当时許多人。

“把孔子裝飾得十分尊嚴时，就一定有找他缺点的論文和作品出現。即使是孔夫子缺点总也有的，在平时誰也不理会，因为聖人也是人，本是可以原諒的。”（“在現代中国的孔夫子”，“且介亭雜文二集”，104頁）

在另外的地方，魯迅对孔子哲学思想中的積極进取的人生态度是肯定的。他說：

“至于孔老相爭，孔胜老败，却是我的意見：老，是尚柔的；‘儒者，柔也’，孔也尚柔，但孔以柔进取，而老却以柔退走。这关键，即在孔子为‘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事無大小，均不放松的实行者，老則是‘無为而無不为’的一事不做，徒作大言的空談家。……于是加以漫画化，送他出了关，毫無愛惜。”（“出关”的“关”，“且介亭雜文末編”，65頁）

从以上的論述中，不难看出魯迅認為孔子是一位“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事無大小，均不放松的实行者。魯迅認為这种人生态度是可取的。据我們所知，魯迅在这一点上确也有几分孔子的精神。对老子的学說，現在还没有得到一致的結論，他的“無为而無不为”是不是“一事不做”，这个問題还在研究中。但是，老子的思想确实有它的消極退守的缺点。这种缺点也确实給中国人民留下了許多不好的影响，魯迅反对老子的这一方面完全是应当的。

墨子是中国人民所熟悉的另一个偉大的思想家。魯迅在“故事新編”中曾生动地、忠实地用艺术的形象的手法使这位思想家重現在讀者的面前。魯迅集中写出墨子为了宋楚兩國人民的利益，以十日十夜的时间徒步从魯国赶到楚国，用他的智慧和勇敢，折服了好战的楚王和貪功的公輸般。这是在中国人民中間流傳了几千年的故事。通过魯迅笔下的墨子形象，使讀者認識到墨子的英雄形象是可敬的。墨子一貫反对不义的侵略战争，但他不向侵略者乞求和平，而是靠自己的力量保衛和平。可見中华民族愛和平、反对战争是有它的优良傳統的。而对待好战分子的态度又表現了中华民族的坚强的性格。魯迅的憎恨历史上侵略者奴役人民的暴行，魯迅的艰苦朴素的生活，对劳动人民的关怀，在一定程度上接近墨子。（事实上，墨子这种思想，并不看作他个人的思想，应当認為他体现了中华民族优良品質的一部分。）我們只要翻开魯迅的著作，随处都使人感到他对帝国主义侵略行为的憎恨；他对卖国投降者的痛斥；他对那些“媚态的猫”，为敌人驅使的“乏走狗”是怎样的鄙視；使我們感到做一个真正的中华民族兒女又是怎样地值得自豪。愛好和平、保衛和平的决心和信念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来的优良傳統。魯迅繼承了这一傳統。

中国古代另一个偉大思想家庄子，对魯迅的影响也是深刻的。

魯迅在他的“故事新編”中嘲笑了莊子的“無可無不可”對於是非、真假都無所謂的、模稜兩可的態度。在魯迅的天才的筆下，似乎使得飄飄然曾化為蝴蝶的莊周，在現實生活面前，不能模稜，無法“無可無不可”的時候，不得不顯出“窘急”，使他不得不從所謂“超脫”的空想中還原為一個普通的人。像這種“無可無不可”，“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的相對主義，確實是莊子思想中主要落後的一方面。它反映了悲觀失望、看不見前途的自我陶醉的消極思想，這種思想是有害的。

是不是魯迅對於莊子的思想沒有吸收呢？也不是的。莊子的思想中也還有它的進步的一方面。比如莊子對當權派富貴的輕蔑，對盜竊“仁義道德”的辛辣的諷刺，對庸俗市儈的嘲笑，對統治者的消極不合作，笑傲王侯的傲骨，在中國的廣大知識分子中也曾起過好的影響，這種人生态度也確曾使歷代剝削階級的統治者感到不方便。也正因为莊子的思想在一定的程度上有不受拘束，浪漫自由的性格，所以幾千年和忠誠為封建統治者服務的孔孟學派的倫理道德觀念有些抵牾。莊子本人在舊中國的哲學史上遠遠不能和孔孟并肩，因為他不大像“聖賢”，只好退居于諸子之列，不能算作正統，只好歸入“異端”。

因此，我們不能認為魯迅沒有在莊子的思想中吸取進步的東西。只有善於繼承文化遺產的、具有卓越的見解的思想家才懂得從過去的豐富的文化遺產中吸取什麼，拋棄什麼；只有那些思想的懶漢，才安心當古人的奴隸，抱着死人的骸骨不放手。這一點，可參看郭沫若先生的“莊子與魯迅”（“今昔蒲劍”，275—295）一文。文章中肯定了莊子思想的價值，並指出魯迅在思想上所受的莊子的影響。郭沫若先生文章所涉及的，這裡不再重複。

魯迅自己深知莊子思想中的“無可無不可”的自由主義的觀念的危害性，所以在許多文章中勸青年不要讀莊子。他說：

“……就是思想上，也何嘗不中些莊周、韓非的毒，時而很隨便（作者按：隨便是指的莊子思想的毒害），時而很峻急（作者按：這裡是指的韓非的思想的危害）”。（寫在“墳”後面，“墳”，262頁）

魯迅還對那些勸青年學生讀“莊子”、“文選”這兩部可以教會人們做文章的說法提出反對的意見，

“我們試想一想，假如真有這樣一個青年後學，奉命惟謹，下過一番苦功之後，用的莊子的文法，文選的語彙來寫發揮論語、孟子和顏氏家訓的道德的文章，‘這豈不是太滑稽了嗎？’（答“兼示”，“准風月談”，183頁）

根據以上的理由，魯迅的見解是對的。那些復古的形式主義者使青年在莊子和文選中揣摩文法，撿撿字匯，無非要把青年們變成“古董”，這是應當反對的。魯迅對他們的駁斥是十分必要的。

中國文學史上第一個偉大詩人——屈原——對魯迅的影響也是極為深刻的。

屈原的偉大成就和他在中國以及世界文學史上不朽的地位，早有定論，這裡不再多說。屈原不但是一位文學家，他還是政治上遭受迫害、不得諒解、被不合理的社會所戕殺的偉大思想家。他是中國歷史上所有愛國憂民，堅持正義，為真理而活着，為真理而死去的光輝的榜樣。他也是被“正統派”認為缺乏聖賢氣象，具有叛逆性格的人物之一。

我們試看，魯迅對這位偉大的詩人和思想家是怎樣地發出由衷的歌頌：

“离騷者……其辭述己之始生，以至壯大，迄于將終，虽怀內美，重以修能，正道直行，而罹讒賊，于是放言遐想，称古帝，怀神山，呼龙虬，思佚女，申紆其心，自明無罪，因以諷諫……次述占于灵氛，問于巫咸。無不劝其远游，毋怀故宇，于是馳神縱意，將翺將翔，而睠怀宗国，終又宁死而不忍去也。”（汉文学史綱，全集卷10，545頁）

魯迅在他早期的“摩羅詩力說”一文中即對屈原作出正確的估價，他認為屈原的偉大，就在于他具有“放言無憚，為前人所不敢言”的堅強獨立的性格和偉大的理想：

“惟灵均（作者：灵均即屈原）將逝，胸海波起，通于罗，返顧高丘，哀其無女，則抽写哀怨，郁为奇文。茫洋在前，顧忌皆去，懟世俗之渾濁，頌己身之修能，怀疑自遂古之初，直至百物之瑣末，放言無憚，為前人所不敢言”。

魯迅認為唯一美中不足的就是屈原的作品“多芳菲凄惻之音，而反抗挑战，則終其未能篇”。我們對屈原的要求，當然不能和近代民族主義覺醒時期的作家相比。但魯迅對屈原的反抗傳統，追求真理的精神是嚮往的。所以在“汉文学史綱”中，魯迅認為宋玉、唐勒、景差之徒只學到了屈原的詞藻的華麗，而屈原的“九死未悔”追求真理的精神却喪失了。這一批評是恰當的。屈原對魯迅的思想的影響，可參看許壽裳先生的“屈原和魯迅”一文（“亡友魯迅印象記”5—8頁人民文學出版社），這裡不再重複。

除了上面所列举的先秦时代影响的深远的偉大思想家魯迅的影響以外，魯迅對於秦汉以後的一切帶有反抗壓迫、解放個性的思想家，對於實事求是、痛恨虛妄的夸大的思想家，對於敢于向偽善者進行揭發的思想家，都加以肯定和表揚，並吸收他們的長處。這種追求真理，對抗權威的思想鬥爭在魯迅幼年時代已經開始，馮雪峰同志曾對於魯迅這一方面思想發展的綫索作過可信的研究和說明：

“根据魯迅本人的自述、別人的追記以及我們所已得到的材料，我們現在已經有充足的証据可以証明魯迅在这十二个年头中讀了不少的中国古籍。他不仅有“过目不忘”的記憶力，并且每每有新穎的見解，而對於旧的观点和封建的、宗法社会的傳統的倫理观念常有敢于持异的勇气。同时在所謂正統的經、史之外，對於野史和杂集之类具有特別的興趣。因此搜尋、閱讀以及抄录，也特別的勤快，而且，少年魯迅也曾經勤于尋訪紹興的文物遺迹，抱着誠敬愛慕景仰的心情去對待紹興府屬的先賢們。而對於這些先賢中的具有反抗思想和愛國精神的詩人、文士與學者的著作的搜尋也更為熱誠”。（馮雪峰論文集第一卷，256—257頁，人民文學出版社，1953年版）。

魯迅給他的好朋友的孩子開過一張書單，其中除了一些工具性的書以外，只有少數幾種，就在这少數的幾種之中，有汉代偉大唯物主義者、反宗教迷信的先進思想家王充的“論衡”；有記載魏晉時代曠達率真、不拘禮法的人物言行的“世說新語”；有揭露唐代“文人取科名之狀態”的“唐摭言”；有“論及晉末社会狀態”的“抱朴子”外篇；有記錄明末清初之“名士習氣”的“今世說”。（參看許壽裳著“和我的友誼”，亡友魯迅印象記，93—94頁）

像魯迅所開的這些書固然不是什麼隱僻難見的著作，但和衛道者們所標榜的那些束縛人的言行，麻痺人們思想的“五經四子”、“聖經賢傳”有本質的不同。

魯迅是主張一切事物都在變化發展的，他反對形而上學的停滯不變的歷史觀。有些

人主張魯迅的發展和進化的觀點是來自西方的進化論，這種觀點是有根據的。但也不能否認，魯迅之所以堅信進化論，並能較快地接受進化論，和他對於中國固有歷史發展的思想是分不開的。進化論的學說是西方的，在中國古代的哲學遺產中，關於歷史要進化，不能返到古代去的觀念對於魯迅來說並不是陌生的，比如先秦的“韓非子”、漢代的王充“論衡”都大同小異地提出社會要改變，歷史不能倒退，反對“今不如古”的陳腐守舊思想，魯迅曾說過曾受過韓非思想的“毒”，學了他的“峻急”。魯迅決不是說韓非的思想中充滿了毒素。

事實證明，莊子和韓非子中反復古主義，反對經典中的宗教迷信，反權威、反偶像崇拜的思想，早已被歷代的“聖人之徒”目為“非聖無法”。可見魯迅並沒有中了古人的什麼毒，倒是吸取了他們思想中的進步因素，從而豐富了自己的營養。

王充“論衡”更是一部反對泥古不化、大胆宣揚無神論的著作。王充提出種種論據，說明人類歷史不是退化的，不是“一代不如一代”。這種進步的、符合或接近科學的思想給魯迅的唯物主義的思想打下了良好的基礎。這種思想強有力地構成了魯迅在接受馬克思主義以前的主導思想。魯迅在很長的一段時期內，凭借了進化論作為武器，向封建復古主義、歷史循環論、歷史倒退論種種謬說展開了鬥爭，這是事實。如果認為魯迅的進化觀點完全是從西方移植過來的，和中國固有的唯物主義哲學思想的傳統沒有關係，這是不符合事實的。

在漢以後的偉大唯物主義思想家中，魯迅還受過嵇康的思想的影響。此外阮籍等人也是魯迅所敬佩的。嵇康這些人，在封建時代敢於向庸俗虛偽的禮教用行動來抗議，敢於和當權派不合作，甚至不惜犧牲了自己的生命。當司馬氏父子為了自己的利益在那裡扮演“堯舜禪讓”的丑劇時，他敢“非湯武而薄周孔”。嵇康這種行為，是當時媚俗的、奴顏婢膝的那些讀書人所不敢做的。象嵇康、阮籍這些人，他們出身於剝削階級，不可避免地帶有剝削階級的弱點，比如迷戀飲酒、享樂，過着疏懶放縱的生活，這是他們的弱點。魯迅從這些人物的思想和行動中也吸取了他所要的東西。魯迅稱贊他們不板起面孔來教人學“聖人”，他們針對聖人法定的“學而時習之，不亦悅乎”的古訓，居然說，“人是並不好學的，假如一個人可以不做事而有飯吃，就隨便閑游，不喜歡讀書了，所以現在人之好學，是由於習慣和不得已！”（《魏晉風度及文章與樂及酒之關係》，而已集，108頁）。

魯迅對於嵇康、阮籍這些魏晉名士寄予深切的同情，並且隨時表揚他們。因為這些提倡個性解放的人物，不但在當時對當權派的虛偽陰謀進行了鬥爭，而他們的影響，對後來的許多“封建余孽”也起着匕首的作用。因此，魯迅從1912年就利用在機關工作的余暇，校訂了嵇康集，到1924年出版。這一工作，說明了魯迅是怎樣地不憚煩勞，對於古代敢於反抗暴力的偉大思想家表現的敬意。

此外，凡是在中國歷史上多少有過反對封建壓迫，具有反抗精神的思想家，魯迅都隨時發揚他們的學說。就戰略戰術上來說，以古人的進步的思想攻擊那些食古不化的頑固思想更容易收到戰鬥的效果。

封建倫理加給人民的枷鎖之一就是“孝”道。在“孝”的壓力下不知葬送了多少有為的青年男女的幸福，斷喪了多少天才發展的機會，更不可容忍的是在“孝”的包庇下，長輩可以胡作非為，甚至荒淫無恥，因為他是“長輩”。魯迅首先向廿四孝中的標本開刀。魯迅

对灭绝人性的“郭巨埋兒”，丑态百出的“老萊斑衣”，荒誕不經的“王祥臥魚”、“孟宗哭竹”，进行了憤怒的控訴，無情的諷刺和鞭打。使得那些假道學們在真理面前不得不陷于張皇失措的境地。魯迅在这战斗中特別引用了二千年前进步思想家孔融的見解：

“父之于子，当有何亲？論其本意，实为情欲發耳。”（“我們現在怎样做父亲”“坟”。124）

魯迅借用了孔子的嫡派子孙的話，向那些自称“孔子之徒”們提出反駁。孔融这种見解，也不是从孔融开始就有的，远在东汉时代的王充的著作“自然”篇和“物勢”篇中早已說过，父母生子女說不上什么“恩”，只是“男女合气”的自然結果。魯迅就是这样吸取古代哲学中进步思想的优良傳統，以他的鋒利的匕首割断那些長期束縛人民的“四大繩索”

（見毛澤东选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这种斗争，体现了中国人民的共同願望。我們經常記得为千千万万的进步人类所傳誦的名言：

“背着因襲的重担，肩住了黑暗的閘門，放他們到寬闊光明的地方去；此后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我們現在怎样做父亲”“坟”115頁）

魯迅不愧为人类灵魂的工程师，不愧为偉大革命的旗手，他的偉大理想，慈愛深宏的胸襟永远激动着我們。今天的新中国，每一个人从思想上，政治上，都得到了徹底的自由，真正的平等。我們在紀念魯迅时，“飲水不忘掘井人”，我們必須記取先进的思想家們，为了爭取后代的幸福，曾經付出过多少慘重的代价！

自从汉代董仲舒以来，在哲学史上的正統派思想家經常奉行着“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形而上学的戒律。这种千古不变的正統思想經常占統治的地位，盤据在人心。統治階級为了防止任何的变革，也經常以“遵古”、“仿古”当作首要原則。这样長期盤据人心的結果，使得封建統治者安心，可以用“不变”的原則来压制任何要求变革的思想。魯迅从人民的利益，从中国哲学史上另外的一个傳統，向这一些陈腐的觀念展开了斗争。

“可惜中国太难改变了，即使搬动一張桌子，改裝一个火爐，几乎也要血；而且即使有了血，也未必一定能搬动，能改裝。”（“娜拉走后怎样”“坟”149頁）

恰恰和这种傳統相反，中国古代有許多杰出的樸素的辯証法思想家，象古代的老子、庄子（在一定程度上）、周易以及后来許多进步的哲学家都对辯証法做出过不同程度的貢獻。这些思想家們用他們的哲学思想丰富了中国文化遗产。魯迅在这一观点上，也同样繼承并發揮了辯証法的思想，他从世界觀上坚决反对“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唯心主义的、形而上学的观点。魯迅認為变化和矛盾是絕对的，靜止不变的状态只是相对的。变革的力量一定战胜保守不变的力量：

“平和为物，不見于人間。其强謂之平和者，不过战事方已或未始之时，外狀若宁，暗流仍伏，时劫一会，动作始矣。故觀之天然，則和風拂林，甘雨潤物，似無不以降福祉于人世，然烈火在下，出为地函，一旦憤兴，万有同坏。其風雨时作，特暫伏之見象，非能永劫安易，如亞当之故家也。

……人得是力（作者按：矛盾斗争的力量），乃以發生，乃以曼衍，乃以上征，乃至于人所能至之極点”。（“摩罗詩力說”“坟”59頁）

从以上的發展进化的世界觀出發，魯迅对当时旧中国因循守旧的思想提出了严厉的指摘。在“故事新編”“理水”一篇中，用生动深刻的描写，把那些昏庸頑固分子的滑稽無知

的丑态刻划在紙上。故事中說禹知道了他的父亲治水用培土的方法阻止洪水失敗以后，就改用疏导的方法。下面是禹和那些頑固昏庸分子們的對話：

“……(禹)我經過查考，知道先前的方法，‘湮’，确是錯誤了。以后應該用‘导’！不知諸位的意見怎么样？”……“一位白鬚白髮的大員……坚决的抗議道：‘湮’是老大人の成法，‘三年無改于父之道，可謂孝矣。老大人升天还不到三年。’”

魯迅在这篇小說所丑化了的“大員”們，在实际上並沒有被作者有所夸大。他們的确是在旧中国成群結队地分布在社会上每一个角落。他們自己既不要革新，还要死躺在別人企圖革新前进的道路上，阻擋一切人的去路。这些小丑們，在魯迅的打击之下，显得那么蒼白、無能、令人作嘔。

还是这些封建主义、买办階級的走狗們，他們害怕任何变革，就象混水缸中沉淀的渣滓一样，唯恐有一点震蕩。他們害怕新事物，深怕外国的事物給他們帶來了灾害。魯迅对这些国粹主义者（实际上是卖国主义者），給以無情的鞭撻：

“汉唐虽然也有边患，但魄力究竟雄大，人民具有不至于为异族奴隶的自信心，或者竟毫末想到，凡取用外来事物的时候，就如將彼俘来一样，自由驅使，絕不介怀。一到衰弊陵夷之际，神經可就衰弱過敏了，每遇外国东西，便觉得仿佛彼来俘我一样，推拒、惶恐，退縮、逃避，抖成一团，……”（“看鏡有感”，收，181）

正如魯迅所指出的，中国过去的优良傳統，是对任何外来文化，只要是人民喜欢的，对人民有利的，我們都是欣然接受；我們自己的文化，只要是对其他民族有利的，我們也从不是因为是自己的什么国粹而吝嗇不給，这是中国民族的优良的傳統。淪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时期，統治者們才变得神經過敏起来，若說这些国粹主义者們根本拒絕一切的外来的东西，也不尽然；进口的享乐奢侈品，进口的鴉片烟，他們倒是拿来就用，处之泰然的。

如果說魯迅的革命思想不过是古代进步思想家的繼續和發展，这也不完全符合事实。魯迅的革命思想，从一个进步的唯物主义者，發展到一个坚强的馬克思主义者，从进化論的世界觀發展成为辯証唯物主义的思想战士，这是一个飞躍的过程，这一过程要归功于党的領導，归功于魯迅的長期斗争的革命实践。这样，才使他从一个自發地为人民的解放而斗争的勇士轉变成为一个自觉的在党的領導之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英雄。

“魯迅是封建宗法社会的逆子，是紳士階級的貳臣。”（瞿秋白文集，977）正是由于他是正統派所疾視的“逆子”和剝削階級的“貳臣”他才有条件繼承了中国文化中最丰富、最有价值的，和正統派对立的思想体系。这一思想体系和頑固派所保衛的“正統”思想体系同样的源远流長。魯迅所繼承的才是真正的民族文化遺產。